

江右王门学派研究

以吉安地区为中心

井冈山大学庐陵文化研究中心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李伏明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南昌）

本书系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招标项目成果（项目编号JD16126）

江右王门学派研究

以吉安地区为中心

李伏明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右王门学派研究：以吉安地区为中心 / 李伏明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7. 11

ISBN 978 - 7 - 210 - 09937 - 6

I. ①江… II. ①李… III. ①王守仁(1472 - 1528)
—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248.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83450 号

江右王门学派研究：以吉安地区为中心

李伏明 著

责任编辑：吴艺文

封面设计：章 雷

出 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 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 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邮编：330006)

编辑部电话：0791 - 86898470

发行部电话：0791 - 86898893

网 址：www. jxppl. com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毫米 1092 毫米 1/16

印 张：29. 25

字 数：480 千

ISBN 978 - 7 - 210 - 09937 - 6

赣版权登字—01—2017—90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 价：88.00 元

承 印 厂：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Contents

录

上篇：总论

绪言：研究对象、思路和方法 3

一、缘起 3

二、研究对象：什么是江右王门学派 6

三、研究方法：历史研究与哲学研究 16

四、研究目标：历史与现实之间 24

第一章 天理与良心 28

第一节 人生与社会 28

第二节 天理与良心 32

第三节 王阳明与阳明学 52

第四节 良知何在 69

第五节 阳明学内在矛盾的展开与阳明学的传播 82

第二章 江右王门学派：基础理论篇 93

第一节 江右王门学派 93

第二节 地方社会与文化传统 100

第三节 江右王门学派学术理论成就 113

第四节 江右王门学派学者的交流与论辩 139

第三章 江右王门学派:学术实践篇	157
第一节 吉安地区的阳明学讲会(上)	157
第二节 吉安地区的阳明学讲会(下)	174
第三节 江右王门学派与社会教化之一:宗族建设与管理	185
第四节 江右王门学派与社会教化之二:推行乡约	196
下篇:分论	
引言:关于江右王门学派代表性人物	207
第四章 邹守益论	220
第一节 学术与人生	220
第二节 “先生之学,得力于敬”	235
第三节 戒惧慎独以致良知	243
第四节 邹氏家学略论	252
第五章 欧阳德论	261
第一节 学术与人生	261
第二节 良知与“独知”	266
第三节 “循良知”与“致良知”	276
第六章 聂豹论	282
第一节 学术与人生	282
第二节 “良知本寂”	298
第三节 “归寂主静”以致良知	309
第七章 罗洪先论	318
第一节 学术与人生	318
第二节 主静无欲	331
第三节 收摄保聚与仁体说	338
第四节 天下哪有现成良知	349

第八章 刘文敏 刘邦采论	360
第一节 刘文敏简论	360
第二节 刘邦采简论	370
第九章 王时槐 万廷言论	386
第一节 王时槐简论	386
第二节 万廷言简论	404
第十章 胡直 邹元标论	416
第一节 胡直简论	416
第二节 邹元标简论	431
第十一章 余论:阳明学和江右王门学派的现代价值	451
后记	461

上篇
总论

绪言：研究对象、思路和方法

一、缘起

从事江右王门学派的研究,对笔者来说,也许可以说是一个美好的“误会”。

我大学所学的专业是历史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期间的学习和研究方向为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主要接受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的专业训练。但由于毕业后回到家乡的井冈山大学工作,我的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工作事实上很难继续进行。职业和志趣不允许我放弃学术研究,于是将目光投向本地的历史资源。当然,我可以利用我的学术基础,转而从事本地区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这无疑也是很有意义的,但我决定选择庐陵文化尤其是江右王门学派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这是因为,地方史志反复强调,吉安乃“文章礼义之邦”,名流辈出。存世文献也极其丰富,相对于地方社会经济史研究,可能更有意义,也更为便利,而本地的社会经济史似乎并无显著特点。对于一个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和研究的工作者而言,尤其是对于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对于家乡风土人情有深切了解和感受的历史教学和研究的工作者而言,研究本地的社会文化史,发掘研究本地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选择。

发掘和弘扬地方的历史文化传统,既是现代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是推动历史学研究向纵深化方向拓进的内在要求,更是本地历史研究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必须特别说明的是,尽管我以前从事的是地方社会经济史研究,对地方社会文化史研究也一直怀有高度的敬意,但对于那些以学术研究的名义表彰“乡贤”的做法颇为警惕——一些以表彰“乡贤”为目标的所谓的学术研究往往会服务于特定的现实目标,如提高本地知名度,促进本地旅游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等等。不能说这类做法没有价值,但基于这种特定的现实目标的所谓学术研究,往往会把地方上的“先贤”拔高到莫名其妙的高度,这就会严重损害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当然,“谁不说俺家乡好”,但作为一名学术研究工作者,我之所以对江右王门学派产生兴趣,并试图展开深入

研究,毫无疑问有热爱自己家乡的因素,但首先是因为江右王门学派研究公认为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黄宗羲说:“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东廓、念庵、两峰、双江其选也。再传而为塘南、思默,皆能推原阳明未尽之旨,是时越中流弊错出,挟师说以杜学者之口,而江右独能破之,阳明之道赖以不坠。盖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亦其感应之理宜也。”^①这就是说,江右王门学派诸学者绝不仅仅是我的“乡贤”,他们在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举世公认的,用不着我来“表彰”——我生也晚,且学问浅薄,充其量只有恭敬研习的份。从职业角度而言,由于教学工作的需要,我不得不研习中国哲学和思想文化史,其中自然也必须研习宋明理学,研习阳明心学和江右王门学派的学术思想。从我个人的兴趣而言,尽管我的专业是社会经济史,但历来对哲学和思想文化研究特别感兴趣。

明代中叶崛起王阳明心学理论(俗称阳明学)在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尽管从其诞生之日起即饱受非议,尤其是明末清初,否定和攻击王阳明和阳明学大有人在。有人从政治上攻击,认为阳明学应当对明朝的灭亡负责,甚至把阳明学称为“卖国王学”(王夫之语,现代学者熊十力也持此论);从学理上而言,不少人认为阳明学本质上是一种“禅学”,称之为“阳明禅”。“禅学”当然也是一种生命智慧,有其独特的价值,但“禅学”主张“绝伦弃物”,拒绝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与儒家的主张和使命背道而驰,而王阳明和阳明学特别强调人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阳明学的反对者还认为,王阳明一味信任个人内在的良知良能,实际上是有意无意地鼓励人们不学无术,忽略甚至拒绝日常生活实践中的严格修养,这必然产生严重的社会文化后果。明末东林学派领袖人物高攀龙(1562—1626,字存之,江苏无锡人,1589年进士)^②指责说,王阳明的心学“任心而废学,于是乎诗书礼乐轻而士鲜实悟”。“任空而废行,于是乎名节忠义轻而士鲜实修。”^③不能说这些指责毫无道理,但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即便阳明学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地出现了各种消极现象,产生了一些消极后果,那也并不是王阳明本人和阳明学所期待的,实际上,王阳明本人对此有所预见,甚为担心,反复强调必须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但这并不是

① 黄宗羲:《明儒学案·江右王门学案·前言》,《明儒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版。

② 本书中出现的古代学者,在第一次论及时标明其籍贯,生卒年份和字号,此后从略。王阳明后面有专门介绍,江右王门学派学者的籍贯,生卒年份和字号则集中列表介绍,行文过程中从略。

③ 高攀龙:《高子遗书·崇文会语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阳明本人所能控制的。黄宗羲认为,众多阳明后学误解甚至是曲解了王阳明的本意:

致良知一语,发自晚年,未及与学者深究其旨,后来门下各以意见掺和,说玄说妙,几同射覆,非复立言之本意。^①

任何一种思想理论体系,如果不是被视为宗教教义的话,那就必定有其短处和缺陷,既可以证实,也可以证伪。人们可以而且必要认清甚至严厉批判其短处和缺陷,但绝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价值和贡献。阳明学问世后,很快即吸引了众多社会精英,并很快风靡全国,深入草根阶层,这本身即说明了其巨大的价值和魅力。阳明学的现代价值也为世所公认。海内外学者人们也以各个角度,各个层面研究发掘其现代价值。阳明心学理论未必能够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济世良方,但可以给人们以巨大的启迪。王阳明抨击当时的世象说:

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琐僻陋之见、狡伪阴邪之术至于不可胜说。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自私自利之实,诡辞以阿俗,矫行以干誉;掩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诋人之私,而窃以为己直;忿以相胜,而犹谓之徇义;险以相倾,而犹谓之疾恶;妒贤忌能,而犹自以为公是非;恣情纵欲,而犹自以为同好恶。相陵相贼,自其一家骨肉之亲已不能无尔我胜负之意,彼此藩篱之形,而况于天下之大,民物之众,又何能一体而视之!则无怪于纷纷藉藉,而祸乱相寻于无穷矣。^②

王阳明所猛烈抨击的世象,不能不说与现代社会的诸多现象具有相当的相似性。应当说,很多人不是不知道各种纪律、制度、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不是不知道和谐相处的重要性,不是不知道廉洁奉公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这些“知道”并没有转化为实际的行为。王阳明指出,关键在于人心。是的,人心坏了,信仰没了,各种纪律、制度、法律法规的作用也就非常有限,甚至可以被某些人作为遮羞布使用。我们可以而且也应当从阳明学理论中汲取营养。

① 《明儒学案·姚江学案》。

② 《王阳明全集·语录二·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姚延福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王阳明的著名弟子,浙中王门学派领袖王畿(1498—1583,字汝中,号龙溪,浙江山阴人)称:“先生倡明此学,精神命脉,半在江右。故江右同志诸兄传法者众,兴起聚会,在在有之,虽未能尽保必为圣贤,风声鼓舞,比之他省,气象自别,不可诬也。”^①黄宗羲则认为,“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而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学术工作者,我们自然可以通过深入研究江右王门学派,更好地研究和认识阳明精神,研究和认识阳明精神对江右地区,尤其是对吉安地区的影响。对我而言,学习和研究江右王门学派,既合乎自己的兴趣爱好,同时又具有显著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研究对象：什么是江右王门学派

我们研究的对象是江右王门学派,为此首先必须界定“江右王门学派”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长期以来,包括本人在内,人们习惯于使用“江右王门心学”或“江右王学”这样的概念,但严格地说来,使用这一概念其实是很不严谨的。^②整个江右地区阳明学者众多,学术思想和旨趣差异巨大,实际上并没有形成“江右王门心学”或“江右王学”这样一门学问,更不用说形成这么一个理论体系了,充其量是对江右籍的众多阳明学者学术思想的笼统称呼,从学理上说,这种笼统的称呼不仅是不严谨的,而且容易引起误解,使人们误以为存在着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江右王门心学”学术理论。但是,我们可以认定存在着一个“江右王门学派”,大致上可以给出“江右王门学派”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学派即学术流派。简单地说,就是基于大致相同的学术思想理念和宗旨而形成的具有自身鲜明特色和传统的学术群体。学术思想理论在发展和传播的过程中形成不同的流派是一种自古即有的社会文化现象,源远流长,情形复杂。大致说来,学术流派的形成通常是由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即师承因素、地域因素或“问题”因素,故学派大致可分为师承性学派、地域性学派和“问题性”学派三大类。所谓师承性学派,是指因师承传授导致门人弟子共同研究传播一门学问而形成的学术流派,如阳明学派即是一个师承性学派;所谓地域性学派,是指因某一地域(地域可大可小,大到可以是某一国家,或某一民族,或某一文明,

^① 《王畿集·与三峰刘子问答》,《王畿集》,吴震编校,凤凰出版社本,南京,2007年。

^② 使用“江右王门心学”或“江右王学”这一名词概念的著述甚多。笔者撰有《论阳明心学的内在矛盾与江右王门心学的发展》,载于《吉安师专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二期。其他的如吴宣德著有《江右王学与明中后期江西教育发展》,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徐儒宗著有《江右王学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等。

小到可以是某一小区域,甚至某一学校)的学者群体基于大致相同的学术思想理念和宗旨而形成的具有地域特色和传统的学术流派,如现代经济学中的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剑桥学派、洛桑学派等等;“问题性”学派则是指以某一问题为研究对象而形成具有特色的学术传统的一些学术群体,如经济学中的重农学派、供应学派、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等等。

必须指出的是,历史上大多数的所谓的学派,其实是旁人尤其是后人基于认识研究的需要而划分命名的,身在其中的学者们未必有明确的学派意识或门户之见。在学术思想理论的发展和传播过程中,师承因素、地域因素或“问题”因素往往相互联系、相互渗透,而不会泾渭分明,可能既有师承因素,又有地域因素和“问题”因素渗透其中。当然,通常有某一种因素占主导地位,甚至具有决定性影响,其中师承性因素尤为重要。其次,任何一个学派的学者都是活动在一定的地域,而且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因此,以地域冠名的地域性学派的学者的活动地域有可能大大超越所冠名的地域,反过来,并不是该地域内的所有学者都隶属于该地域性学派,体现出该学派的地域性特色和传统。另外,一个学派在传承发展过程中,又可能衍生出不同的子流派,所谓“派中有派”,如阳明学派之下,又衍生出不同的王门学派。

我们所使用的“江右王门学派”这一概念主要基于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江右王门学案》。黄宗羲专列“江右王门学案”,介绍了一批而不是所有的江右籍王门学者及其学术思想——这些人及其追随者就是“江右王门学派”。《明儒学案》是一部学术思想史著作,作者基于自己的学术理念,同时也是基于研究和论述的需要,将明代重要学者的学术思想分门别类。他将众多的阳明学者划分为不同学派。显然,所谓“江右王门学派”,既有师承性因素,又有地域性因素。在师承性因素方面,该学派学者都是阳明弟子或再传弟子,或阳明后学,都以研究和传播阳明学为己任,故称王门学派。就地域性因素而言,既以“江右”冠名,自然是彰显其地域性特色和传统,也就是说该学派的学者及其领袖人物基本上来自江右地区。“江右”大致上就是现在的江西省所辖区域。不过,由于综合了师承性因素和地域性因素,因此,并不是所有江右籍的王门学者都体现出地域性特色和传统,反过来,体现出地域性特色和传统的王门学派的学者未必一定是江右籍。换言之,并不是所有的江右籍的王门学者都隶属于江右王门学派,同时,并不是所有的江右王门学派学者都是江右籍。

实际上,当时各地众多的阳明学者并没有特别的门户之见,未必有所谓的

学派门户意识。对他们而言,大家都是在探究成仁成圣之道,他们相信阳明学为“圣学”,故在大力研究和传播阳明学。他们往往只是在具体的学术观点方面有所不同,甚至针锋相对,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密切交往,深入交流,相互之间取长补短。尤其到了第二代和第三代阳明学者,具体的师承关系更是错综复杂。包括黄宗羲在内的后来的研究者是基于研究和论述的需要把阳明后学分为不同的流派——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这无疑是非常必要的。问题的关键显然在于有合理的学派分类依据和标准,也就是如何正确界定江右王门学派的地域性特色和传统,该“学派”的学术思想理论如何有别于其他“学派”。

我们还是回到黄宗羲对学派的理解。他在《明儒学案》的凡例中说:

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

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①

也就是说,黄宗羲对有明一代的学术思想分门别类的依据便是所谓的“学术宗旨”。在黄宗羲那里,所谓“学术宗旨”,主要指其学术思想的“实用”追求,当然也包括其理论内涵。所谓“实用”,一方面是指某种学术思想理论为学者个人提供有效的安身立命的依据,另一方面也指其实际的社会影响——即该学术思想理论发挥了重要的社会作用,有效地教育和引导着人们追求成仁成圣,达到圣人的精神境界,所谓“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

从学术思想的理论内涵而言,师承关系自然是非常重要的,从学术理论的实际社会影响和功能而言,地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毕竟,师承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术思想的具体内容,而具体的社会影响往往是发生在特定的地域内——主要是学者们的家乡和其学术活动所在地。据此,黄宗羲将阳明后学分为浙中王门学派、江右王门学派、南中王门学派、楚中王门学派、北方王门学派

^① 《明儒学案·发凡》。

和粤闽王门学派等六大派,另外还单列了泰州学派,黄宗羲并没有冠之以“王门”。

关于江右王门学派,黄宗羲是这样阐述的:

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东廓、念庵、两峰、双江其选也。再传而为塘南、思默,皆能推原阳明未尽之旨,是时越中流弊错出,挟师说以杜学者之口,而江右独能破之,阳明之道赖以不坠。盖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亦其感应之理宜也。^①

在黄宗羲看来,江右王门学派的学术宗旨是追求和捍卫王阳明的真精神,他们努力“推原阳明未尽之旨”,批判阳明学在传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流弊,并以阳明真精神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依据和生活实践的指针。尽管在如何追求弘扬阳明真精神,如何“推原阳明未尽之旨”方面,江右王门学派学者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江右王门学派学术观点,并且相互辩难,但这并不妨碍其自成一派。

正因为如此,黄宗羲虽然以地域命名学派,但并不包括该区域内所有的阳明学者。以江右地区的王门学者为例,一些著名阳明学者,虽然出生、成长并且主要活动于本地区,但由于其学术宗旨与该江右王门学派的宗旨不同,黄宗羲就会将其排除于江右王门学派之外。如永新县人颜钧(1504—1596,字子和,号山农)、永丰县人何心隐(1517—1579,原名梁汝元,字乾柱,号夫山)、南城县人罗汝芳(1515—1588,字惟德,号近溪,1553年进士)、丰城县人李材(1519—1595,字孟诚,号见罗,1562年进士)等,他们的学术宗旨与江右王门学派明显不同,都不被认为是江右王门学派学者。颜钧、何心隐、罗汝芳被列入《泰州学案》,被认为是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李材因其学术思想别具一格,被黄宗羲单独列为《止修学案》,必须指出的是,颜钧师从过刘邦采,李材师从过邹守益,但这种师承关系并没有使他们成为江右王门学派的一员。当然,由于江右王门学派既然以地域冠名,该学派学者自然绝大多数是江右籍,这主要是因为该学派的领袖人物长期在自己的家乡从事学术理论和社会实践活动,在本地拥有巨大声望,在本地士人中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在家乡培养出了一批继承者。更进一步说,由于江右王门学派第一代领袖人物邹守益、欧阳德、聂豹、罗洪先

^① 《明儒学案·江右王门学案·前言》。

等人都来自吉安府^①，他们又培养出了一批继承者，使阳明学在吉安府几代传承，江右王门学派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袖人物也来自吉安府，故而江右王门学派学者大多来自吉安，吉安因此成为江右王门学派的基地。

当然，也有不少的阳明学者群体，他们在学术理论上看起来并无特别显著特征，但经过他们的努力，阳明学理论在自己的家乡得到传播，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地域特色明显。如南中王门学派，黄宗羲是这样阐述的：

南中之名王氏学者，阳明在时，王心斋、黄五岳、朱得之、戚南玄、周道通、冯南江，其著也。阳明歿后，绪山、龙溪所在讲学，于是泾县有水西会，宁国有同善会，江阴有君山会，贵池有光岳会，太平有九龙会，广德有复初会，江北有南谯精舍，新安有程氏世庙会，泰州复有心斋讲堂，几乎比户可封矣。而又东廓、南野、善山先后官留都，兴起者甚众。^②

也就是说，南中地区的王门学者虽然在学术理论上的成就和特征看起来并不特别明显，但由于本地学者热衷于在地方上传播和普及阳明学，加上地近南畿，各地著名阳明学者来此地讲学，极大地促进了阳明学在该地区的传播，并在地方上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本地学者创办了众多阳明学讲会，使得该地区的阳明学研究和传播非常有特色，“几乎比户可封矣”，因而被黄宗羲认为存在着一个南中王门学派。而且，就王阳明本人的学术宗旨而言，南中王门学派学者的努力所产生的这种社会影响是极其重要的。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从地域角度而言，泰州属南中地区，《南中王门学案》中包括了泰州地区的阳明学者。但泰州的王艮（1483—1541，初名银，王阳明为之改名为艮，字汝止，号心斋）不仅仅被黄宗羲认为是南中王门学派学者，更是泰州学派的创立者。黄宗羲单列泰州学派，是因为王艮曾师事王阳明，但其理论与王阳明的学说颇有区别，他并不认为泰州学派是阳明后学的一个学派，更难以将泰州学派视为南中王门学派的组成部分。为此，黄宗羲单列《泰州学案》，而不称为“泰州王门学案”，以示与其他王门学派有所区别。黄宗羲称：

^① 明代的吉安府辖庐陵、吉水、永丰、泰和、万安、龙泉（今遂川）、安福、永新、永宁九县，地域与今吉安市稍有不同，今属吉安的新干县、峡江县明代属临江府。

^② 《明儒学案·南中王门学案·前言》。

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然龙溪之后，力量无过于龙溪者，又得江右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决裂。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羲以为非其聪明，正其学术也。所谓祖师禅者，以作用见性。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释氏一棒一喝，当机横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诸公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故其害如是。^①

也就是说，泰州学派主要是在学术理论上有着极其明显的特征，即走向禅学，“祖师禅者，以作用见性”。在黄宗羲看来，他们不但没有正确地弘扬阳明精神，反而对阳明精神是一种严重伤害。因为纯粹是以学术宗旨分类，其成员自然不以地域籍贯为限，实际上遍布各地。换言之，泰州学派是一个师承性学派而不是地域性学派，之所以命名为泰州学派，仅仅是因为其创立者王艮乃泰州人。

浙中是王阳明的故乡，王阳明晚年曾长期讲学于此，四方学者纷纷来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黄宗羲理所当然最为重视。但黄宗羲指出，除了钱德洪（1496—1574，又名宽，字洪甫，1532年进士，世称绪山先生）、王畿外，其他阳明学者并没有什么创造性，他们或墨守师说，或有溺于禅的嫌疑，或向程朱靠拢，逐步背离阳明精神，甚至“挟师说以杜学者之口”，只因为遭到江右王门学派的有力批判，才使得阳明真精神不至于泯灭。黄宗羲之所以认为存在一个浙中王门学派，列浙中王门学派于诸王门学派之首，一方面是因为那里存在大批阳明学者，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浙中是王阳明的故乡，体现其阳明学的地域渊源。

其他如楚中王门学派、粤闽王门学派、北方王门学派，黄宗羲虽然以地域命名专列学案，但在全国学术思想界的影响其实并不大，很难说形成了一个地域性的学术流派，主要是本地的某些有一定政治社会地位的阳明学者传播了阳明学，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以北方王门学派为例，黄宗羲为其列传的学者有七人（楚中王门学派和粤闽王门学派各只为两人列传），但他指出：“北方之为王氏学者独少，……非二孟嗣响，即有贤者，亦不过迹象闻见之学，而自得者鲜矣。”^②黄宗羲为他们单列学案，显然是意在表明阳明学的全国性影响。

① 《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前言》。

② 《明儒学案·北方王门学案·前言》。